

空间重构与自我呈现逻辑变化： 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动因探析

刘峰，严三九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00072)

摘要：随着短视频平台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短视频使用中出现了诸多传媒伦理失范问题，如侵犯隐私、内容低俗化、网络暴力等。基于青年群体短视频空间的角度，发现青年短视频用户在使用中打破了物理空间与媒体空间的界限，自我呈现的逻辑发生了改变，同时未意识到“前区”“后区”的重构，为短视频伦理失范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4) 01-0060-07

“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影像技术等的发展与合一，使短视频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文化形态和媒介景观”，^[1] 短视频平台已经深度介入社会生活，重构着受众的信息生产与交流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传媒伦理失范问题；而且当下具有代表性的短视频平台均是基于算法机制发展起来的，与传统图文社交平台相比，短视频平台的伦理问题具有诸多新特征，需要研究者予以关注和研究。青年群体的传媒伦理失范是短视频传媒生态下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有必要把握青年群体的短视频应用习惯、梳理青年群体在短视频使用中存在的代表性问题，探究青年短视频伦理失范的动因，并做出相应的对策思考。

一、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问题及空间视角

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赋予受众新的信息交流行为，“移动短视频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基本认识图式和固有行为方式”。^[2] 青年是短视频平台使用、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群体，“短视频通过视觉呈现不仅满足了当今青年视觉化社交的需求，更赋予了青年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话语权”。^[3] 短视频平台也成为青年亚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增强了网络文化的复杂性、体现了社会心态多元化，比如青年短视频秀文化“体现着这一群体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网生代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青春心态，主播群体急于求成、不择手段的逐利心态等”，^[4] 短视频平台成为各种亚文化内容、符号聚集与传播的渠道。当然，短视频在发展中也存在诸多不利于青年健康成长的问题，体现在短视频内容、传播方式、算法机制等诸多层面，比如针对短视频内容生态中存在“无视法律规范，冲破道德底线，传播一些包括暴力、色情、虚假信息”^[5] 等问题。

(一) 青年传媒伦理失范

传媒伦理失范是新闻传播领域研究具有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近年来新兴媒体形态不断涌现，催生诸多新的传媒伦理问题，研究者体现出一定的前沿意识，对新现象、新问题进行了及时把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三维一体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研究”（20AZD058）；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媒体实践关系扩展与再造研究”（22FXWB014）。

作者简介：刘峰，男，副教授，博士；严三九，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如针对算法带来的伦理失范问题,基于对算法伦理的认知维度和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梳理,把握算法作为新兴的技术中介所蕴含的价值观问题。^[6]再如面对网络直播、短视频的影响,把握网络直播主持人伦理失范现状,^[7]反思短视频创作中存在的拍摄方式失当、占用公共资源等伦理问题等。^[8]青年群体传媒伦理问题研究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不仅是建设健康传媒环境的内在要求,在引导青年成长方面也具有现实意义,“青年在网络中的行为是否文明,影响着网络空间是否风清气正”。^[9]针对存在的诸多问题,学者们更加关注如何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伦理规范、打造更加健康的媒体空间,“需要不断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和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10]

(二) 空间的视角

西方哲学、社会学领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空间转向近年来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并且在诸多领域得到创新性应用。“正在兴起的移动短视频重新构建了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论里的生活空间”,^[11]一方面,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技术、传播方式成为改变不同主体空间感知、意义的新要素,“不同的媒介形态并非中立、被动的媒体技术,而是主体知觉空间转换的必要条件,是情境意义生成的差异中介”;^[12]另一方面,短视频本身便具有比较明显的空间形态特征,而且短视频内容涉及对空间影像的组织、重构,短视频传播与消费又涉及不同空间主体之间交流、互动甚至关系再造,“人们在‘记录美好生活’的口号下沉迷于短视频所构建的生活空间里,这个由新媒介营造的空间里正生产、制造出各种新的社会关系”,^[11]所以从传统空间生产理论及视角出发便于发现“短视频叠加了原有空间并不存在的经济意义与关系意义,带来了资本资源与话语权力的再分配”。^[13]基于可见性的视角,短视频对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的影响均能够得到体现,“平台在物质性空间里设置了可见性的‘密码’,推动了空间内容的生产,同时通过拓展社会关系,再造了一个社交性空间”,^[14]这种影响能够在诸多社会空间的发展或重构中得到体现,比如短视频背景下的乡村空间“经历了土味实验、空间生产、媒介认同三个阶段的重构,此过程反映了审美趣味的悖反与重塑、创作主体的生成与拓展、视觉修辞的对峙与合流”。^[15]可见,短视频的发展正在重构青年群体的空间表达、展演与互动方式,面对这一特殊的新兴空间,有必要运用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工具,深入研究青年群体的短视频伦理失范问题,将前沿问题与创新视角相结合,力争取得兼具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问题

短视频社交平台兴起较晚,管理规制体系仍处于建设之中,平台上的青年用户群体也存在诸多差异,不同地域、不同兴趣、不同成长经历的青年群体在平台上的发布喜好、信息偏好也有着明显差异,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出现的青年伦理失范问题与现象也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的复合特征。为了整体把握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特征,为提炼针对性的防范、引导策略打下基础,在此结合以下四个代表性问题,对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予以分析。

(一) 侵犯隐私

因为空间屏障的消失,使得更多个体生活空间中的“后台”内容会通过短视频被展示、传播开来,这成为短视频平台上隐私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在法律层面来看,隐私权的客体范围会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而得到扩展,“传统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生理缺陷、身体残疾、婚恋经历等,而网络环境下隐私权的客体包括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QQ号、微信号、网上购物踪迹、网上聊天记录等”,^[16]而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隐私权客体内容将会进一步扩大,诸多属于主体生活空间“后台”的内容成为隐私权客体。比如有青年在抖音发布街头偷拍的搭讪女生的视频以赚取流量,但是“拍摄者与拍摄者的这种交往互动包含了被拍摄者的容貌、语言、声音及所处场所等方方面面,属于被拍摄者的社交隐私

范畴,从法律意义上应该被认定为隐私权所保护的私密活动”,^[17] 这种未经同意的拍摄、传播行为已经构成违法。

(二) 内容低俗

内容低俗已经成为短视频平台的一大顽疾,青年群体在其中既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与其他媒体形态相比,审核机制尚不完善的短视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低俗内容传播提供了便利。在大量短视频作品中,生产者打着娱乐的旗号,在语言文字、视频画面等方面放低把关要求,甚至有的生产者将生产低俗化内容作为吸引眼球、集聚流量的手段,“从传播伦理学视角看,这是网络社会新闻传播主体和网民集体伦理失范的结果”。^[18] 这种现象将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电子媒介扒光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遮羞物,使社会赤裸地呈现在儿童眼前”,^[19] 在经过一定阅读量的积累之后,这样的内容势必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基于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如果形成针对青少年用户的低俗内容茧房,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三) 身体问题

短视频平台存在大量打擦边球的内容,消费身体、色情等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容易对青年群体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容易在短视频平台获得青年群体的关注。从身体的视角出发,对于观者而言,这反映了青年群体通过短视频介入他人后台空间进行窥视的问题;而对于拍摄者、传播者而言,便是希望把身体展演作为工具来实现获取流量等目的。正如福柯所说“身体作为新的易变因素的载体而出现,不仅作为在少数与多数之间、顺从与倔强之间、富与穷之间、健康与疾病之间、强健与虚弱之间新的易变因素的载体,而且也作为或多或少可投资利用之间,或多或少易于进行利润可观的投资之间”。^[20] 比如抖音制定了相关措施,严格处罚发布色情、淫秽等内容的账号,多地的文化市场、网络管理部门也对相应的发布者采取了处罚措施,但是抖音的内容生态中还存在大量消费身体的灰色地带,仅仅依靠行政处罚、平台规制还难以遏制。对于青年来说,无论是身体的展示还是窥视,均体现了复杂的心理及文化现象。比如“从补偿心理出发,通过极端而无序的身体表演和行为展览冲破大众话语的场域封锁和信息闭流,以短视频这种打破阶层限制的技术赋权来进行内容生产,实现对权力的想象、对主流的模仿、对世俗规则的争夺”。^{[15](118)} 对这一问题的审视,不仅需要从短视频内容层面加强管理与引导,更需要在明确青年心理特征及亚文化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对身体消费等问题进行有效管理。

(四) 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长期以来困扰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危害大、影响广,具有较大的防控难度,“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杀的案例”。^[21] 比如2018年5月一名26岁深圳女孩因发布抖音视频后得到一些负面评论而受到打击,竟然跳海轻生,所幸被游客救起。青年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很多网络暴力以温和的方式存在,但对青年的伤害却很大。特别是在短视频兴起之后,为网络暴力提供了带有隐秘性特征的传播渠道。比如大量不理智网友可以在评论区对短视频内容进行谩骂、讽刺等,这种不便被监管的方式在特定情形能够对正常的视频发布者产生负面的心理冲击,甚至导致其产生心理问题或疾病。

三、青年短视频空间的重构与自我呈现逻辑的变化

根据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形态的变化意味着各种主体之间空间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空间权力的调整、空间主体行为方式的转变等。对于青年群体来说,面对短视频平台对其生活空间的介入,大量青年用户并未明确意识到不同空间场景之间的差异,对于在各种空间之间“切换”的过程中应遵循怎样

的空间规范、如何处理不同空间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约束自身的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茫然”的状态。而把握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明确青年短视频空间与生活物理空间的差异,进而基于短视频空间重构的过程把握青年群体自我呈现逻辑的新变化。

(一) 青年短视频空间的重构

长期以来,青年自身生活所处的物理空间与媒体所展现的媒介空间是很少具有交集的,无论是报刊的纸张、电视的荧屏、计算机的屏幕,都成为区分、阻隔两种空间的屏障。青年置身于自身所处的物理空间,通过媒介平面观看经过机构媒体编辑后呈现的媒介空间;这是一种具有距离感的阅读、观看模式,观者与媒介空间中呈现的人物、事物不存在直接交流。只有在极少部分情况下,比如青年或身边熟悉的人作为被采访对象参与到媒体生产过程中,其生活空间才会被带入到媒介空间中,阅读与观看的距离感在这种情况下会被打破,但这并未赋予观者与被观者以面对面的生活交流感,而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具有差异化的审美感受。

青年群体在社交短视频的使用过程中打破了上述物理空间与媒体空间的分离。“社交媒体的视觉化消费在重构人们生活世界之同时,视频场景亦演化为生活方式本身”。^[22]一方面,青年可以将自身的生活空间转化为短视频内容的场景元素,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出去,特别是在自拍类的短视频内容之中,生活场景已经成为媒介空间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作为观者的青年能够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多种方式与短视频内容进行实时互动,通过这些方式达到面对面交流的传播效果,进而介入手机屏幕背后的媒介空间之中。所以基于短视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无论是作为传者还是观者的青年,都处于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界限被打破、两种空间相互嵌入与交融的状态之中,基于短视频传播实现了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的重构,这正是短视频空间生产的主要特点与内容。

在青年群体基于短视频使用而出现的生活空间、媒介空间重构过程中,体现了同时作为传者与观者的不同青年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原本相互不具备交集、因为空间区隔而极少产生互动的不同青年主体,可以基于短视频观看、审视甚至介入彼此的生活空间。原本,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之间的界限或界面虽然阻隔了不同主体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但也对青年群体的生活空间起到了保护作用,阻隔了外部主体的介入;但是,随着短视频时代这种界限的消失,青年生活空间也由此失去了空间屏障的保护,转而作为媒体内容元素成了所有观者媒介空间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媒介空间是一种能够交互、点评、介入的空间。由此,传者与观者之间除了传统的“传”与“观”,还可以开展各种新型互动。这种新的空间形态为空间主体提供了发生冲突的条件,进而为产生各种新的传媒伦理失范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 青年在短视频空间中自我呈现逻辑的改变

为了呈现青年群体在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中的行为,在此借鉴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进行把握。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其拟剧理论的主要观点,探讨不同主体怎样通过表演来控制自身想要呈现的形象,通过演员、表演区域、观众等不同要素对各种主体如何开展戏剧表演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短视频传播中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的重构为青年主体提供了特殊的表演区域,“表演区域被划分为准备表演常规程序的‘后台’和呈现表演的‘前台’,连通这些区域的途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其目的在于防止观众看到后台,同时防止局外人看到表演”。^[23]在戈夫曼预设的表演区域中,“前台”是主体表演、展现的空间区域,是其塑造自身预期形象的舞台,主体在舞台上展现自我、与观众互动,“以上互动情境得以完满运转起来的一个核心设定就是‘前台’必须是一个有其界限的交往区域……这一相对闭合的交往区域确保了个体之间能够以面对面的方式互动”,^{[23](203)}与前台相对应的是后台,不同于前台的表演状态,主体在后台空间中更多地呈现生活状态,“表演者在后台会相对随性、举止放松、彼此更加亲昵,而在前台表演时则会谨小慎微”。^{[23](111)}

青年在短视频空间中的表演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第一,短视频中的表演“前台”不是连续、完整的空间,而是经过蒙太奇处理、精心剪辑的片段式空间,“面对面的表演是连续的、实时的、全角度的,人们会以当时的语境作为背景参照,做出自认为更加完备的判断”。^[24]但是青年在短视频“前台”中的表演是经过筛选、剪辑的,他们会选取适合展示的空间部分、最满意的表演片段进行传播,由此,大量“后台”片段经过精心筛选、取舍、剪辑之后被呈现于“前台”。第二,经过上述筛选、取舍、剪辑的操作,最终呈现出的“前台”与“后台”具有同构性,由此青年在短视频“表演”过程中,后台变成了前台,青年主体开始将自身生活空间中的诸多场景、元素转移到媒介空间;另一方面,很多青年主体直接将生活空间中的“后台”状态呈现在“前台”,“表演”的程度得到了削弱,自我把控同时也被弱化,“有意无意地将生活中的后区推向了自我呈现的前台,场景间的区隔变得扁平甚至消失,给传统的传播伦理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和挑战”。^[25]

四、青年短视频传播伦理失范的动因探析

短视频对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的重构改变了青年的展演方式,随着青年“前台”与“后台”之间界限的消解与融合,青年的生活空间经过短视频拍摄、传播的处理之后转变成为媒介空间的碎片化元素,这种生活空间碎化、重构的过程是在诸多主体因素的驱动之下完成的。空间重构的过程赋予青年更大的展示舞台,但很多青年主体在短视频使用过程中并未意识到其“前区”“后区”在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得到了交融,忽视了对自身隐私等信息的保护,也有很多青年在获得“介入”他人“后区”权力的同时放松了对自身道德的把控,由此为诸多短视频伦理失范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于青年在短视频空间中自我呈现逻辑的改变,结合平台上存在的典型伦理失范现象,特别是短视频空间中这些现象所体现的复杂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分析青年在短视频平台的空间行为对空间结构与关系的影响,进而更为深入地探讨传播伦理失范问题的深层动因。

(一) 不同主体空间权力结构与关系的调整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赋权,新媒体技术跨越时空的传播,这意味着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重构”。^[26]媒体传播形态与方式发展的过程同样是不断改变空间结构与空间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过程,短视频的发展赋予青年更大的深度观察、拍摄、重构各种社会空间的权力。他们获得了介入、组织媒介空间的可能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生活空间片段、构建个性化的媒介空间,而他们所介入、组织、重构的并非完全是自身所在的生活空间,而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侵犯他人的生活空间。可以说青年对自身新兴空间权力不自觉或者不当应用成为滋生伦理失范问题的根源之一。

“当前互联网增速放缓,但短视频行业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视觉化社交已然成为现在重要的社交方式之一”。^[27]短视频平台并非仅仅是对生活空间的介入与再现,因为当下的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青年社交的主要平台,社交的过程大幅提升了各种青年主体对不同生活空间的介入频率。短视频传播中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的重构使“剧班”“前台”“后台”等概念的原本形态得到改变,基于短视频传播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得到了重构,两个空间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生活空间的屏障消失了,在赋予青年更大“表演”自由的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一方面,青年主体生活空间的“后台”区域被自行透明化并呈现于“前台”,后台已经不再需要观众通过“闯入”的行为来介入,而是直接由青年有意或者无意地展示给观众;另一方面,开放的评论区为观者的“闯入”提供了便利,在没有空间屏障的前提下,很多观者会选择“闯入”他人的生活空间进行点评。这种点评在缺少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也会成为伦理失范的动因之一。由此,随着青年社交方式、需求的多元化,对各种生活空间的介入方式也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驱动青年传媒伦理失范问题多样化发展的风险。

(二) 青年自发展演诉求强, 缺乏足够的媒体伦理意识

“在多样化使用媒介技术、展现出多种角色的同时, 使用者也部分地突破了平台为之预设的产消者角色框架”,^[28]“前台”“后台”的融合是青年成为短视频平台的产消者; 随着“前台”“后台”的消解, 青年的生活空间已经全景展示在媒介空间之中, 但诸多青年并未提升个人隐私保护意识, 而是面对更大的展示的空间与成名的想象, 被极大地激发了个人展示的积极性。以乡村青年为例, 从普通青年到“老铁”的身份转化使很多青年乐在其中, “乡村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背景’被嵌入叙事结构中, 农民在经济生产、文化传播、日常生活中的自主表达、能动创造和自觉振兴的意愿得到展演”。^[29]青年主体自我展演的需求被激发出来, 但绝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仍有待提升, 面对自我展演的需要及短视频社交工具, 部分主体不懂得如何在符合传媒伦理道德的范围之内处理自身及他人生活空间的选择与传播问题。

(三) 技术迭代带来新的媒体伦理失范风险

“技术赋权使用户下沉为多元化的个性释放提供了场域”。^[30]新兴数字技术在短视频空间重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终端的普及是短视频时代到来的基础驱动力量, 也成为短视频空间中重要的权力要素, 为改变各种空间主体之间的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促进更多下沉用户卷入到视频创作中, 社交网络平台降低了日常用户面对这些技术实践的困难性”。^{[22](109)}对于青年来说, 其短视频技术实践的困难性越低, 则介入生活空间的能力便越强, 技术对青年在短视频空间中的赋权也越大。进而, 原本处于平衡状态之中的多方主体、传受双方之间的关系被打破, 掌握短视频工具的青年成为介入空间的掌权者; 但复杂的是, 在短视频空间中, 青年不仅是掌权者, 同样也是其他掌权者的被介入者。各种掌握着窥视与介入权力、但又不具备足够防御和自我保护意识的青年, 在短视频空间中肆意展现, 大幅提升了传媒伦理失范问题发生的几率。

此外, 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将在传播过程中为青年再度赋权。目前, 短视频平台提升算法推送权重的指标是视频作品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完播量等; 即平台关注的是视频作品是否受观众欢迎, 而不是视频作品的艺术质量、社会效益。由此, 大部分符合受众感官需求、能够吸引眼球的作品便有机会获得更大规模算法推送的机会。随着算法权力嵌入到短视频空间结构, 加大了青年短视频传媒伦理失范问题的复杂性与规制难度。

综上, 短视频已经成为青年生活、交往的基础社交平台, 而在5G、AI等技术的驱动之下, 短视频平台对青年生活空间的介入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介入方式也将不断多元化。“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带来可见性的赋权”,^[31]短视频平台对青年群体信息生活的介入形式是简单的、相对容易把握的, 但是基于空间视角的审视可见, 这种介入对于青年群体的信息接受与处理方式、自我呈现与互动习惯、智能媒体平台使用与交互等多方面的影响却不简单。作为使用者的青年主体、短视频平台主体、作为规制方的短视频管理者、技术提供与支持者等均有必要审视因短视频平台介入而出现的青年群体传播伦理失范问题, 深入探讨其背后的逻辑与动因, 为规范不同主体的空间行为、有效解决传播伦理失范问题创造条件。

五、结 语

在短视频打破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界限的背景下, 有必要通过上述策略重建一层传媒伦理的过滤网、保护层, 这是修复短视频空间的必要策略。对短视频空间的修复并非是重新拉开生活空间与媒介空间的距离, 而是要明确短视频健康发展的方向, 按照有益于提升社会效益与引导青年成长的原则, 实现短视频空间主体关系的优化。这种对短视频空间主体关系的优化及权力结构的调整最终要落在青年主体的“前台”“后台”展演的过程中, 让青年明确虽然生活空间的“前台”“后台”界限已经消

融,但作为从生活空间向媒介空间转化的展演活动是有限度、有规则的,不能随心所欲、不顾后果;需要引导青年明确媒介空间运营在传媒伦理层面的全方位要求,认识到自身生活空间与他人生活空间之间存在不可见但不能忽视的空间界限。总之,青年短视频伦理失范,从空间视角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融合了多方主体博弈的复杂问题,未来仍需要协调多方主体持续关注、共同解决。

参考文献:

- [1] 蔡之国,孔令淑.价值引领视域下短视频的文化狂欢与规训治理[J].未来传播,2021(3):78-83.
- [2] 林峰.移动短视频:视觉文化表征、意识形态图式与未来发展图景[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144-149.
- [3] 周宣辰,程倩.视觉文化视域下青年短视频消费的文化反思[J].学习与实践,2021(3):118-124.
- [4] 刘胜枝.商业资本推动下直播、短视频中的青年秀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心态[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5-12.
- [5] 雷雳.莫让不良短视频污染青年学生[J].人民论坛,2018(32):104-105.
- [6] 段鹏,李嘉琪.隐藏的价值观:平台媒体算法的伦理考量和权力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92-97.
- [7] 马嘉.网络直播主持人伦理问题研究[J].传媒,2018(5):90-91.
- [8] 林爱珺.当前短视频创作的伦理审视[J].人民论坛,2021(4):63-65.
- [9] 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J].中国青年研究,2019(6):41-45.
- [10] 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J].探索,2020(5):181-192.
- [11] 苏克军,曲涌旭.移动短视频的空间视域解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136-140.
- [12] 张梅,赵冀.从知觉空间改变到意义生成再造:剧场、视听与社交媒体中的京剧传播[J].现代传播,2020(7):90-95.
- [13] 王建磊.空间再生产:网络短视频的一种价值阐释[J].现代传播,2019(7):118-122.
- [14] 何志武,董红兵.可见性视角下移动短视频的空间生产、消费与价值悖论[J].新闻记者,2019(10):12-19.
- [15] 刘汉波.从土味实验、空间生产到媒介认同——短视频浪潮中的乡村空间[J].学习与实践,2020(6):116-124.
- [16] 杜启顺.新媒体时代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中州学刊,2017(10):52-55.
- [17] 刘珊.多名女子路遇搭讪被偷拍视频传上网甚至包括高中学生[EB/OL].<https://news.cctv.com/2020/11/28/ARTIzDUMc7XYqbajRtvZePyz201128.shtml>.
- [18] 孙慧莉.传播伦理学视角下网络社会新闻低俗化问题研究[J].中国出版,2017(23):64-66.
- [19] 高德胜.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9.
- [20]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21] 徐颖.论“网络暴力”致人自杀死亡的刑事责任[J].政法论坛,2020(1):132-142.
- [22] 王昀.打卡景点的网红化生成:基于短视频环境下用户日常实践之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2):105-112.
- [23] [美]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3.
- [24] 张骁鸣,常璐.拟剧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网络社区人际互动研究——以豆瓣网“穷游”社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9(7):98-109.
- [25] 陈琦.场景消解:女性网络自拍中的后区迷失[J].现代传播,2020(2):82-85.
- [26] 周孟杰,吴玮.三重勾连:技术文本、空间场景与主体行动——基于湖北乡村青年抗疫媒介实践的考察[J].中国青年研究,2021(1):78-86.
- [27] 罗兰.戏精文化:城市视域下当代青年短视频社交表达[J].湖北社会科学,2020(12):162-168.
- [28] 毛万熙.公共空间的共同生产:数字媒介如何形塑城市意象——以抖音地标AR特效为例[J].学术论坛,2020(9):31-39.
- [29] 杨彪,郭昊天.农民的“出场”:短视频中的乡村振兴图景与话语表征[J].新闻爱好者,2021(2):48-50.
- [30] 董玉芝.技术赋能与身体传播:移动短视频戏仿实践的价值重构[J].现代传播,2020(11):27-32.
- [31] 尹连根,刘运来.短视频平台的技术赋权与可见性劳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J].未来传播,2021(6):41-49.